

异化中的“屈从性崇拜”

——析二十世纪中期美国小说中被异化的疯癫

蒋 天 平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文化思潮急剧转变。理性与非理性交替影响时代文学的生成。神经错乱或精神失常形象成为文学创作中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人物形象的生成方面是个体因为与主流社会的差异而抗议,另一类则因欲望对人性的异化造成欲念狂人。弗洛姆认为异化是致人精神失常的重要因素之一。屈从性崇拜是对自身欲望的顺从而丧失自我。被异化的“疯癫”往往具有恶的品质,折射出其背后的作者所批判的时代文化精神。文章罗列各种被异化的形象,分析其表现以及背后的文化成因。

[关键词] 美国小说; 异化; 狂人; 权力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2)01-0118-05

异化是一个哲学和社会学概念。马克思主义认为异化是人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及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弗洛姆认为异化主要是人作为与客体相分离的主体被动地、接受地体验世界和自身。在《健全的社会》中他提到异化中的“屈从性崇拜”形式。与偶像崇拜不同,屈从性崇拜不仅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屈从关系,还包括人与自身之间的屈从关系。“我们说到的偶像崇拜和异化不仅存在于与他人的关系中,而且存在于与自己的关系中,……在这个意义上,这个精神病患者成了一个被异化的人。……他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所操纵,所扭曲。一个精神错乱的人是一个完全被异化的人,他完全丧失了认识自我的中心地位,他已经丧失了自我意识。”^[1]引文所强调的屈从即指个体为欲念所惑而屈从于自身的欲望,失去自我成为欲望的奴仆。在20世纪中期美国普遍被认为是一个疯狂、荒诞的年代。文学作品中涌现出大量可被定义为“屈从性崇拜”的异化形式,如被权力异化的权欲狂、嗜好战争的战争狂,被科学技术异化的科学狂,以及以杀戮为快感的嗜血狂。他们就是文学想象中的精神病患者。

一 被异化的权欲狂人

罗素认为,“权力欲是正常人性的一部分,但权力哲学在某种明确的意义上却是疯狂的。……凡是让自己的权力欲使他们产生一种变态的世界观的人,都应当住进疯人院……”^[2]罗素因此区别了权力欲和权欲狂,后者因追求权力而造成人性变异和自我迷失。权欲狂具有权威人格,机械地向传统价值投降,盲目屈从权威,盲目憎恨反对者,思想僵化,酷爱迷信。屈从权势,施淫威于弱势又使他们带有施虐狂与受虐狂倾向。“独裁主义性格的实质一直被看作虐待狂和受虐待冲动的同时并存。虐待狂旨在以不受限制的权力,多少带有破坏性的方式支配另一个人;受虐狂旨在将合格自我消融于一种压倒一切的强权之中,以分享其威力和荣耀。”^[3]独裁主义性格即所谓的权威人格。

权力是二战后文学想象背后社会和政治背景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冷战以及麦卡锡主义的横行强化了美国政府的权力,集权主义日益加强。金斯伯格认为国会、审判庭、政府机构、纳粹和大军是集权主义的全景图,梅勒夸张地描述美国集权主义特色,“集权主义的洪水——集权主义的建筑、集权主义的

[收稿日期] 2011-12-06

[基金项目] 2009年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二战后美国文学和文化中的男性气质研究”(编号:09YBB345)、2011年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课题“资本主义现代性下的非理性体验——战后二十年美国小说中的疯癫研究”和2010年南华大学社科基金项目“神圣的疾病——20世纪中期美国文学中的疯癫”(编号:2010XSJ04)资助

[作者简介] 蒋天平(1972-),男,湖南衡阳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高速公路、集权主义的烟雾、集权主义的食物、集权主义的通讯联络。”^[4]权力成为国家秩序和社会秩序最明显的存在方式。《凯恩舰哗变》中的魁格舰长、《第22条军规》中的卡思卡特上校、沙伊斯科普夫少尉,以及《裸者与死者》中的卡明斯将军、克罗夫特等正是国家权力的载体,突现权威主义人格:在权威面前唯唯诺诺,见风使舵;在下级面前强横、专断。卡思卡特上校无休止地增加飞行任务,沙伊斯科普夫不停地阅兵,魁格不停地为琐碎小事惩罚士兵,他坦言“我懂得如何对付这些黑猴子……”,“我真担心把他们吓死了,但不时地这样吓唬一下他们对他们的灵魂有好处。”施虐狂造成他人的受虐倾向,个体内在的自卑、无能和无足轻重感在受折磨和屈从了外力的受压迫状态中获得变态快感。凯恩号舰上的官兵将淫猥下流的玩笑当成对魁格舰长淫威的抗议正是受虐心理使然。

不少战争小说的主题都是关于军队中上下级之间的权力压迫与反抗。在梅勒看来,军队代表有组织的国家暴力和集体镇压。军队权力的目的是消除个人主体性,排除多样性,强化统一性,这是美国权力发展的精髓^[5]。《裸者与死者》中卡明斯将军代表了梅勒所批判的权力观:推崇尼采、希特勒的极大主义,权力象征超人意志和力量,利用“恐怖”理论来管理军队,消灭阻碍权力的人性。瓦尔登进一步指出,该小说的“中心冲突是‘系统’的机械性力量与个人完整性的冲突。统治者卡明斯将军象征着杰出的无情的法西斯权力与控制,他与铁腕的克罗夫特军士一同使得这个机器非人格化。”^[6]《白鲸》中亚哈船长和《比利·巴德》的兵器官克莱加特以及维尔舰长身上也体现着卡明斯、卡思卡特和魁格身上表现出来的权力欲望。在军队中,上级军官普遍患有或隐或显的偏执狂、虐待狂和权欲狂倾向,尤其是舰船上的军官具有更绝对的权威,小说《凯恩舰哗变》中的魁格舰长是其典型。舰船出海后形成与外界隔绝的权力环境引发权力的至高性和船长们偏执加迫害的病态心理,大海恶劣的生活环境需要偏执狂和迫害狂树立极权来传达和执行命令。同时作者需要一个极权情节和环境来揭示权力的斗争,因为在战争小说的两条战线中,相对于外部敌人本方的军官是一个比敌人更危险的威胁士兵生命的“敌人”,因此战争小说中军官与士兵之间的冲突成为战争小说中关于权力控制的重要主题。

罗素认为这个时代的特点之一就是疯狂在文学、哲学和政治方面大行其道,源于对权力的冲动往往使疯狂能够实现人物的目标^[7]。不同时代产生不

同的疯癫,20世纪50、60年代疯癫来源于权力欲望的膨胀。表象明显的疯癫往往因为暴行易于被确认而关押入狱、受拘禁,所以他们的危害性较小,而握有重权的真正的疯癫却呈现出比较理性的表象和思维而难被识别,从而造成更大的灾难。中国成语“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正是这种状态的真实反映。冯尼古特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府中权欲狂在美国没有民主可言,整个人类就是对权力疯狂着迷的猩猩,总统就是嗜权如命的猩猩,并进而指出占据权力的一定是些疯子们,只有神志不清、患精神病的人才竞选班长,想当总统^[8]。

二 偏执的战争狂人

战争狂人通过追求战争来达到个人不合常理的目的。福柯认为权力是战争的延续而非相反,权力成为战争的目的。卡明斯宣扬“战争不是为了理想而战,它仅仅是一种权力的集中”,战争的目标就是用一种更合理、更巧妙的权力取代旧世界衰退的法西斯主义。因而战争小说中权欲狂和战争狂雌雄同体,卡明斯将军、卡思卡特上校、哈登伯格便是这双重身份的典型代表。然而文学人物的塑造都以史上最大的狂人希特勒为原型。历史上希特勒就是一个精神偏执狂患者,患有晚期梅毒引发的偏执狂幻想症和梅毒性痴呆精神疾病:麻痹性痴呆、判断力变差、身体机能衰退,头痛、失眠、肌肉无力、双手颤抖、口齿不清、四肢抽搐、瘫痪,常产生幻觉。二战小说《战争与回忆》和《战争风云》通过美国海军武官亨利和纳粹将军冯·隆从远到近描述了希特勒从天才堕落成疯子的蜕变过程。小说中的虚拟人物德军元帅冯·隆在战后回忆录《作为军事领袖的希特勒》中指明莫斯科战役标志着希特勒精神的质变,此后他开始歇斯底里、偏执、妄念,幻想自己在指挥、调度虚妄的部队。福柯认为最典型的疯癫表象之一是“最纯粹、最完整的错觉(张冠李戴、指鹿为马)形式。它视谬误为真理,视死亡为生存,视男人为女人,视情人为复仇女神,视殉难者为米诺斯。”^[9]希特勒是二战中一个最大的偏执狂人。与他相对的是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他们的理性、智慧和意志与希特勒相对照,预示战争是理性对非理性、正义对非正义的胜利。疯狂与失败、精神疾病与邪恶(道德的缺失)之间的隐秘关系一直是古典时代以来人们对精神疾病的传统认知,也同样延续到现实主义作家们对二战的评论和描述中。精神疾病成为政治学中的隐喻,疾病、恶魔和非正义预示着法西斯战争必然失败。“疯癫”被策略性地建构于希特勒和纳粹

主义的本质之中,证明在现代政治话语中,精神疾病依然邪恶,必然被毁灭。

小说中战争狂人就是纳粹狂人的代名词。希特勒继承了尼采的哲学精神,颂扬战争,呼唤野蛮,“必须做出抉择:要么覆灭,要么达到目的。一个统治种族只能以残忍和暴力为起点成长壮大。……我们情愿做野蛮人!这是个光荣称号。我们将更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气数已尽!”^[10]小说《幼狮》塑造了两个穷兵黩武的战争狂人哈顿伯格和克里斯汀,战场上的“希特勒”,推崇和宣扬尼采的权力意志哲学,鼓吹“嗜血”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第一要义,战争是净化民族血统、提升民族斗争精神和生存意志的唯一方式。哈顿伯格深度揭示了狂人追求战争的本质:战争是人的天性,军队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存在,只有希特勒、戈林、罗姆和罗森堡等癫痫症患者和精神病人才能发动并赢得战争。道格拉斯认为,身体和疾病是整个社会的隐喻,身体和行为同属社会建构产物,其中“脸”是社会和道德语言最重要的表象之一。哈顿伯格英俊的脸被炮弹撕裂,扭曲变形,最后自杀,预示纳粹主义扭曲的表象与疯狂本性的统一,构成病理疯狂、美学疯狂和伦理疯狂三位一体。作者暗示死亡是必然的,因为它在本质上就是腐化、衰败和自我毁灭。冯·隆将军、哈顿伯格等把战争的失败归于希特勒的精神疾病和对尼采意志一定程度上的忽略,其目的就是虚饰罪行。

《茫茫黑夜》中牙医琼斯博士、纳粹军官艾克曼、极端纳粹主义者,以及反纳粹的奥黑尔们都被泯灭了人的良知:无法区别真理与谬误、美与丑,辨识不清理性与非理性,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异。坎贝尔的轮齿说解释了他们的本质:他们的头脑像一个制造精巧的齿轮,由于缺乏某些轮齿造成他们忽略事实,任意行事,德国人因而如此漠视人类文明和生命意义,也造成整个世界的悲剧。这种疯狂既有生理遗传因素,但更多的是历史和社会因素。坎贝尔说“另一些牙齿则被失去控制的历史变化折断了。”历史的折断暗指纳粹思想影响下的疯狂。那些反纳粹主义者打着上帝的名义无节制地憎恨所谓的罪恶,热衷于发动战争,与牙医博士的疯狂没有本质的区别。作者超越意识形态之争,从人道和人性的角度来认为人的价值远远高于国家主义的价值。

三 兽性的嗜血狂人

战争就是杀戮,士兵的职责亦即杀戮。从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和政治学上看,战争杀戮的原因包括发泄对敌人的仇恨,杀戮产生的欢愉感、愉悦感、仪

式感以及战争表现出来的男性气质。人的好斗性、善性和恐惧性等都属社会建构。日本二战老兵在《东史郎日记》中指出士兵的身体和意识就是国家意识形态的结果:敌人是无血肉、无人性的动物,无需人道同情;战争的目的是追求正义、去恶扬善;杀戮能保全自身性命,因而战争杀戮成为必然。凶残的杀戮在战争文学中表现为两种疯狂形式,即狄奥尼索斯的狂欢精神和战争带来的各种精神疾病。

狄奥尼索斯精神强调在情绪的放纵和发泄下打破传统道德禁忌和阶级界限,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自身的和谐。士兵在杀戮中体会到酒神式的狂欢:士兵的战斗装备、脸上油彩、野蛮兽性就是欢宴上的面具,杀戮者利用“战争”这一合法的狂欢仪式,在一个远离社会现实和道德的世界里发泄个体受压抑的欲望,以残杀和死亡颠覆人间的道德秩序和生命的价值体系,在国家和社会道德的支持下满足个人的求死欲望,“自视无辜,在颠覆之余忠于这人心的秩序。”^[11]自然主义创作翔实地描述士兵们杀戮时的狂欢之态和战争的残酷:“老大”(《细红线》)、哈顿伯格和克里斯汀以及埃斯特(《战争与回忆》)激情忘我地屠杀敌人,从鲜血和死亡中获得快感和自我安全感,心想着躺在那里的幸亏不是我,而是其他人。杀戮给他们增添了战争的快乐和胜利的滋味,也见证了那些士兵的成长。二战在某种程度上被理想化为美国青年们的成长仪式,敌人的鲜血和生命就是供奉给上帝的祭奠。“他们相信每一代人都应该拥有自己的战争,战斗经历成为男人成长仪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为他们可以一生也能够炫耀的荣耀。”^[12]男性尊严、男人身份和英雄情结都体现于战场的杀戮之中。另一方面现代战争在反战小说中被去神圣化,骑士文学中的浪漫情调和英雄的自豪感成为昨日黄花,战场成为血腥的屠宰场,骑士间英勇的肉搏变成兽性的杀戮。新兵比德(《细红线》)狼狈、狂乱地杀死偷袭的日本兵,感到厌恶、疲倦、恶心。基于人道主义精神,作家推崇爱与人性,批判所有正义或非正义的杀戮,揭示出战场上人的主体性和生命的神圣性受非理性行为的迫害。《战争与回忆》中纳粹分子格赖泽尔中尉以撒尿辱尸、虐尸作乐,《第22条军规》中哈弗迈耶变态地虐杀田鼠流露出的是嗜血的兽性狂欢。金斯伯雷认为,“我们把疯狂看成是最愤世嫉俗的理性方式。……疯狂是人精神的一部分,理性的黑暗面,无论哪种情况,战争成为疯狂的诱因,让理性的黑暗浮出表面。你可以称之为本能,称之为集体无意识,称之为爱国主义——但是一旦战争打响,人就变成不

同的野兽。”^[13]自古以来,西方文化利用疯癫形式揭示人与兽之间的隐秘关系,疯狂是兽性的隐喻。福柯认为兽性使人疯癫,疯癫是兽性的表现形式,“人身上的兽性……已变成人的疯癫,人处于自然状态的疯癫,只与自己有关。这种以疯癫形式发泄出来的兽性使人失去其特有的人性。……。对于古典主义来说,最彻底的疯癫乃是人与自己兽性的直接关系,毫不涉及其他,也无药可救。”^{[9][73-74]}

四 迷于科学的怪人

二战的实质让人们清晰地认识了权力,也让人们对科技发展给人类带来的益处产生怀疑和焦虑。20世纪60、70年代卢德派批评美国多了技术化而少了人性化,人变得孤单和冷漠。弗洛姆警告说“一个幽灵在我们之间徘徊……:一个全部机械化的社会……由计算机控制着;在这个社会进程中,人类自己被转变为整个机器的一个部件。”^[14]人文主义知识分子对此深感不安,认为科技的发展导致人的异化和环境污染,将最终伤害整个人类文明,“工业社会最终被仁慈地阻挡于自然的粪堆之中,文明将成为历史。”^[15]1965年发生在纽约以及整个美国东北部地区的大停电事件更增加了人们对科技的恐惧心理。索尔·贝娄在作品《赫索格》、《塞姆勒先生的行星》中,以及契弗在《大桥天使》讲述了个人在机械文明面前所产生的恐惧和焦虑,控诉科技文明给人带来的精神危害。在文学作品中那些创造精神危害的科技工作者也常常被塑造成白痴和疯子。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中潜索认为,文明的发展会促进疯癫的生成,一项科学越是抽象或复杂,它便越有可能引发疯狂,“一般而言,文明会构成一个有助于疯狂发展的环境。如果科学的进步会消除错误,它却同时传播研究的爱好甚至研究狂;书斋生活、抽象思辨、精神持续激动,却没有身体运动,它们都可能造成最不幸的后果。”他继续解释说,“人经常劳动的部分会最先补强和硬化,……‘文人则是头脑硬化;他们常常会变得无法连结思想’,因而很可能会导致心神丧失。一项科学越是抽象或复杂,它便越有可能引发疯狂”^{[9]323-324}。

艾尔文·古德纳认为较之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科技知识分子们像是“白痴学者”,他们能做技术解放,但同时也会产生副作用,“即文化的毁灭和社会道德沦丧。”^[16]过度关注抽象知识而忽视感性知识,过度忽视现实生活会使科学知识分子显得单纯、天真、心智失常或者偏执妄想,对人类社会造成巨大危害。这类狂人很早就出现在美国作家霍桑的《拉

帕奇尼的女儿》、《胎记》和《伊桑·布兰德》,玛丽·雪莱的《弗兰克斯坦》,斯蒂文森的《化身博士》以及儒·凡尔纳的《海底二万里》和《抢劫征服者》等小说中。霍桑从清教主义善恶观出发,将理性发展引发的所有问题归之于抽象的“恶”,表露出对科技理性发展的担忧;《化身博士》通过善和恶之间的异形同体揭示了科学造成人性缺乏、人格分裂。美国英特尔公司总裁鲁道夫说在信息技术领域中,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悖论在科技发展中鲜明地表现出来:人需要理性才能创新科技,而创新过程中又需要非理性的热情和追求,因此当科技发展越快,对发明者非理性激情的要求就越高,消费者被异化的程度就越高,因此科技文明给所有人及整个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

20世纪文学现象中的科技狂人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茫茫黑夜》中的琼斯博士是个很有创新能力的牙科医生和化学家,受纳粹种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利用掌握的技术手段来服务于法西斯主义,证明种族优劣理论。作品讽刺了那些为纳粹服务的科技人员是政治上偏执、道德上无知、生活混乱的疯子。《猫的摇篮》中描述了一个缺乏人性、思想异常单纯的科学疯子霍克斯,与世隔绝、缺乏生活常识和对家人的爱,缺乏良知和道德规范,他的存在只会是毁灭人类。作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爱因斯坦得知日本广岛、长崎被原子弹轰炸事件后深感悔恨“早知道是这样,我宁愿做一个鞋匠”。因为人类第一颗原子弹的制造源自他的科学理论。冯尼古特指出正是战争让他明白了科技对人造成的毁灭性危害^[17],在小说《没有国家的人》中,他愤怒、仇视科技,“进步已经让我忍无可忍”,将会导致极度邪恶再次出现。人类文明需要科技的发展,却又必须消除它带来的灾难。冯尼古特认为科技工作者的道德感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契弗在《大桥天使》中也认同爱在这方面的意义。故事讲述一家人患有强烈的文明恐惧症,在面对飞机、高楼大厦、大桥、电梯等现代文明的产物时会不由自主地晕厥、惊恐、战栗。一位女孩的歌声帮助他摆脱了这种恐惧感,“我坚信世上总有那么一种慈悲的力量来帮我涉度难关。”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使人成为大机器上的一个专职零件,人失去温情与人性,抛弃亲人和朋友成为工作机器。现代社会一方面积极挖掘人的各种潜力,同时亦掩盖了人类传统的善和美而变得功利、狂妄和无人性。工作狂人因为对事业的追求严重影响了他的世界观而陷入异化状态,而他们一旦失去了对工作的依赖,也会陷入到精神疾病之中。

五 结论

这些被各种欲望“异化”的狂人因为构成一个文化符号,揭示了当时社会文化思潮和文学主题,权力、战争反思、科技理性对个体人性的扭曲。迪克斯坦认为 20 世纪中期美国小说中“反叛、神经病症以及癫狂都是神志清醒的表现形式”,适应、顺从和神智正常却是极端的病态^[18]。本文所分析的“狂人”与之不同,自身欲望扭曲人性,挤压自我,个体丧失了自我身份。这些形象往往成为了恶的形象,被恶魔般地描画和塑造,成为被谴责的对象。

[参考文献]

- [1] [美]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蒋重跃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3:107.
- [2] [英]伯特兰·罗素.权力论:一个新的社会分析[M].靳建国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211.
- [3] [美]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289.
- [4] [美]诺曼·梅勒.夜幕下的大军[M].任绍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185.
- [5] Joseph Wenke. Mailer's America. Hanover[M]. NH: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87:12-13.
- [6] Randall H. Waldon. "The Naked, the Dead, and the Machine"[M]. Michael K. Glenday. Norman Mailer. Macmillan Press Ltd., 1995:50.
- [7] [英]伯特兰·罗素.权力论:一个新的社会分析[M].靳建国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211.
- [8] [美]库尔特·冯尼古特.没有国家的人[M].刘洪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94.
- [9] Michel Foucault.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Trans. Richard Howard[M]. London and New York: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67.
- [10] [德]赫尔曼·劳施宁.希特勒谈话录[M].伦敦:伦敦出版社,1940:87-88.
- [11] [英]乔安娜·伯克.面对面的杀戮[M].孙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35.
- [12] 胡亚敏.美国越南战争:从想象到幻灭——论美国越战叙事文学对越战的解构[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67.
- [13] Celia Malone Kingsbury. The Peculiar Sanity of War Representations of Madness in World War I Literature[D]. The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2000:4-5.
- [14] [美]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实录[M].朱协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835.
- [15] [美]阿瑟·赫尔曼.文明衰落论——西方文化的悲观主义的形成与演变[M].张爱平,许先春,蒲国良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425.
- [16] [美]艾尔文·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M].顾晓辉、蔡嵘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71-72.
- [17] William Rodney Allen, ed. Conversations with Kurt Vonnegut[M].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88:232.
- [18] [美]萨克文·伯克维奇.剑桥美国文学史:第7卷[M].孙宏主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234.

American Novels in Mid-20th Century

JIANG Tian-pi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In the 1950s and 1960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as witnessed the sharp cultural transition. Trains of rational and irrational thoughts have influenced greatly the literature alternately. Madman has constituted one of the important literary phenomena, because of the conflict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e mainstream of American society, and partly the alienation of humanity by desire. Fromm thinks that alien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for mental disorder. The worship obedient to original desires leads to loss of self. Madness caused by alienation often has done evil, and reflected the authors' criticism against the cultures and spirits of the times behind the literary phenomen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list all kinds of alienated images, and analyze its performance as well as the cultural causes.

Key words: alienation; madman; power; American novels in mid-20th century